

白城

档案文物

带你穿越历史长河，
探寻白城文物背后的故事 {六}

美女们看过来了，我是清代最靓“化妆包”



图为清代缸豆红瓷胭脂盒

我叫缸豆红瓷胭脂盒，是白城市博物馆馆藏文物。我的口径为9.6厘米，底径为5.8厘米，我最早出现于清代康熙年间。今年我已经三百多岁了，我的作用等同于今天女士们的化妆包，用来装扮女子娇俏的面容，让她们以最美的容颜出现在人们的面前。

我的名字，初现于文献《饮流斋说瓷》：“此色亦由祭红变化而来，以类于缸豆，故以缸豆红呼之”。

清代的女子，会将胭脂、具有美容功效的珍珠粉、增添身体香气的香粉、类似于现在口红的口脂等化妆用品，有序地摆放在我的身体中，出门前细细描画，收获一天的好心情；后来，我也被用来存放耳环、戒指和小香囊等小巧首饰。

我的制作难度很大，属于康熙年间铜红釉的名贵品种之一，也被称为“美人醉釉”，这也使今天的我身价不断上涨。

我的形状是圆润饱满、线条流畅的圆形，我的同伴们还有外形优雅、富有柔和之美的椭圆形，棱角分明、显得规整端庄的方形，形似海棠花瓣、富有诗意和浪漫气息的海棠形，如南瓜、石榴等形状的瓜果形……不同的造型，也满足了使用者的不同需求。

在清代，我是一种珍贵的礼品和商品，也是宫廷文化的一部分。通常只有社会地位较高或家境富裕的女性，才有能力拥有我。超高的颜值和稀少的数量，让我成为彰显当时人们尊贵身份和超高品位的有力证明。

我经常通过贸易或文化交流等方式传入东北地区，因此，我的制作工艺和自身价值也得到了充分展现，更促进了东北相关工艺和文化的发展。

我这方小小天地，承载了百年的美丽与哀愁。

数百年光阴流转，我见证了无数女子的青春与梦想。我曾在宫廷贵妇的手中，妆点着尊贵的容颜；也曾民间女子的妆台，为平凡的日子增添亮色。

一抹嫣红，是女子对爱情的憧憬，对美好的向往。在岁月的长河中，我陪伴着她们经历了欢笑与泪水，见证了相思与离别。

当现在的人们凝视着古老而崭新的我，仿佛看到了几百年前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，感受到了她们的呼吸与心跳。

如今，我虽已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，但我承载的百年文化和美丽传奇，依然熠熠生辉。

稿件:本报记者 李政孚

美编:刘健雄 供图:白城市博物馆

马背上的“微型医院”

白城市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中，有一件清代蒙古族药袋。它由木头和皮革制作而成，长106厘米、宽24.5厘米。

蒙古族是游牧民族，当年，他们在进行临时急救和医疗保健时，就是使用这种药袋中的药材为患者治病，它相当于马背上的“微型医院”。

药袋的历史，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300多年。当时的中医曾携带药袋防疫驱瘟、禁蛇毒。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，药袋的容量和用途在不断发展，到了清代，药袋的作用更加完善，能装几十种药物，对人们的疾病进行全面的治理。

由木、皮革、鹿皮、银和钢等材质制成的清代蒙古族药袋，一般挂在身上或放置于马鞍，易于取用。药袋能够经受住风吹、日晒和雨淋，并保持袋内药材干燥、药效持久。

在长方形大药袋内插放着多个小药袋，盛装着各类药材，这些药材不但能治疗人们的疾病，还能保健养生、调理身体。

大多数药袋上还印有蒙古族文纹、回纹和植物花卉等传统图案和装饰元素，蕴含着人们企盼吉祥、平安、祛病的美好寓意。

好寓意。

清代蒙古族药袋，是清代蒙古族医疗发展的实物见证，反映了当时蒙古族的医药水平和医疗实践，为研究清代蒙古族的生活方式、疾病防治及加强与其他民族医学沟通交流提供了宝贵线索。

东北部分地区，在历史上与蒙古族的活动区域有交叉或相邻，随着蒙古族迁徙、交流等活动的开展，药袋也随之传播到东北地区。在清代，蒙古族还与东北地区的其他民族，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有一定往来，促使蒙古族的药袋及其相关的医药知识，传播到东北地区，并与当地的医药文化产生融合，共同促进了蒙古族和东北医学医药事业的发展。

在药袋朴实无华的外表下，蕴藏着对生命的呵护与拯救。当我们手握药袋，接触到坚韧交织的纹理，仿佛能触摸到生命的脆弱，领悟到生命的无常。

我们凝视这穿越千年的药袋，仿佛听见历史的低语。它穿越千年的风烟，每一道缝线，每一缕药香，都是岁月的沉淀。



图为清代蒙古族药袋

芳物于人自有情

●吴震 吴清霞

“主公高意何须道，芳物于人自有情。”这是北宋名臣蔡襄《甲辰寒日游公谨园池》中的一句。蔡襄钟情草木，在他的眼里，一花一草、一枝一叶都是有生命的。他以植物入诗，听自然之声，品人生百态，言志之所向，正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所称“其诗文亦光明磊落，如其为人”。

托木言志，坚定操守志向。“谁种青松在塔西，塔高松矮不相齐。时人莫道青松小，他日松高塔又低。”这是蔡襄年少在塔斗山读书时所作的一首诗。青松虽小，但总有一天会超越塔的高度，成长为参天大树。蔡襄志存高远，相信自己也能如松一般，茁壮成长，越来越高，实现人生目标。

松，是蔡襄理想人格的象征。踏上仕途后，他以松自期，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《宋史》记载，蔡襄出任福建路转运使后，大力提倡植树造林，组织众人在从福州到泉州、漳州的驿路上，“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”。老百姓称赞：“夹道松，夹道

松，问谁栽之？我蔡公。行人六月不知暑，千古万古摇清风。”

庆历六年（1046年），蔡襄曾至福州圣泉寺，写下了《圣泉寺松径》。蔡襄在诗中赞美了松树根基牢固，四季常青，即使风雨交加，依旧傲然挺立，显示出其坚韧不拔的特性。“忽经密荫少休息，肌骨便惊秋气早”，道出了松荫为行人提供清凉的作用，“寄言匠者勿复顾，留作清凉除热恼”，劝告工匠不要乱砍滥伐，让这片清凉长存人心。

蔡襄写松的诗作不少。在《和古寺偃松》中，他写道“横柯圆若张青盖，老干孤如植紫芝”，运用比喻手法，将松树的枝干比作青色伞盖，把老干比作紫色灵芝，赞美了松树挺拔的形态和顽强的生命力。

在他的咏松诗中，蔡襄常描绘松树在艰难环境中依旧傲然挺立的画面，字句之间跃动着生命的力量。诗篇之外，也是蔡襄向世人表明，无论现实多么严峻，

他始终都坚韧不屈、高风亮节，故而欧阳修赞其“巍巍蔡公，其人杰然”。

借花喻己，道明人生态度。“迎腊梅花无数开，旋看飞片点青苔。幽香粉艳谁人见，时有山禽入树来。”这是蔡襄在某年农历十一月见到后庭梅花盛开时所写的一首诗。这首诗用简洁明了的笔触，描绘了梅花不畏严寒、傲然绽放的景象。梅花幽香芬芳，粉艳迷人，却无人欣赏，只有山禽与之相伴。蔡襄通过梅花，借以自喻，即便不被他人欣赏，也要保持高洁，独自芬芳。

再看初冬时节的“佛桑花”，也是如此。佛桑花，即扶桑花，“闽中多有之”。蔡襄在《耕园驿佛桑花》中写道：“可怜万木彫零尽，独见繁枝烂漫新”，将树木的凋零与佛桑花的繁盛进行对比，从而凸显了佛桑花的生机与活力，表达了对其坚韧生命力的赞美与喜爱。这首诗最后两句“名园不肯争颜色，灼灼天红野水滨”，展现了佛桑花独自绽放，不与群芳争艳，而这也正是蔡襄本人淡泊名利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自喻。

蔡襄还会通过写花来抒发对时光流逝的无奈之情。他在《过南剑州芋阳铺见桃花》中写道：“七年相别复相逢，墙外千枝依旧红。只有苍颜日憔悴，奈缘多感泣春风。”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墙外桃花依旧美丽，但自己容颜已老，心中充满无尽感伤。蔡襄以桃花为引，通过“依旧红”和“日憔悴”的鲜明对比，表达了对年华易逝、物是人非的感慨和无奈。

草木情怀，志士心声，蔡襄歌咏植物，更注重托物言志，抒写情怀，由此我们所见的就不只是一花一草、一枝一叶，而是诗人的内心世界。在此，我们可以感受到蔡襄的审美情趣、人格理想、精神品质等等，看到一个高洁自许、有情有义的大写的人。